

## 抗战岁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八年国殇，一朝涅槃，中国人民凭借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民族精神，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抗战的征途中，当时的大学师生一方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在猛烈的炮火中不弃学业，使我国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本期，我们把目光投向在抗日战争中进行过卓绝斗争的高校。

# 湖南大学 见证侵华日军投降仪式

### ■通讯员 曾欢欢

2015年8月15日，红砖灰顶的湖南大学行政楼在烈日中静穆矗立，不断有游人驻足看着门前的介绍：“原湖南大学科学馆，1945年9月15日，长衡地区侵华日军投降仪式曾在此举行。”70年前，在如今的行政楼205会议室，湖南大学作为唯一举行侵华日军投降仪式的中国大学，见证了中华民族“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的历史时刻。

### 蒙难·烽火岁月的文化浩劫

“1938年4月10日，日军飞机轰炸长沙，湖南大学校区被夷为平地，图书馆大楼被毁，仅存数根花岗岩石柱”。这段文字，镌刻在该校被炸图书馆遗址前的石碑上，旁边是三竖两横地停留在当初被炸断时位置的大门柱，地上刻着几个大大的“历史不会忘记”。

这样弥漫着无边战火与血光的记录，在仅为文化教育机构的湖南大学有数处。湖南大学数学院肖伊莘老教授亲历了第一次被轰炸，“整个图书馆都倒塌了，冲天的火光肆虐。在现场，唯一站立的只有图书馆大厅前的四根立柱，附近躺着尸体，有的人被炸碎了，肠子挂在电线杆上。大火整整烧了5个多小时才渐渐熄灭。”这一天，距南迁的故宫国宝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撤离才过数日。

像这样的轰炸，日军在湖南大学有5次。百余师生罹难，图书馆、科学馆、岳麓书院、校舍，烈火冲天，典籍无存，古迹尽毁，生灵涂炭。70年后仍是言者悲怆，听者敛容。

湖南大学在《被敌机炸毁后正告中外文化界宣言》中这样描述了这场文化之殇：“本大学继承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寸瓦片石几皆于文化史有重大

之价值……今强敌一举而焚烧炸毁之，于吾人之损失为何如！于世界文化之损失为何如……”

湖南大学，蒙难；文化教育，蒙难。

### 西迁·科教救国与抗日救亡

“本大学虽罹此浩劫，却以血染为荣；虽不在前方，却以与前方将士及我民众分受牺牲为幸。全体师生决本百折不回之精神，誓与倭寇相周旋，不迁校，不辍课，使我华中仅存之国立大学，不因暴力而炸毁……”这是1938年4月10日第一次被轰炸后，湖南大学向全世界发出的怒吼。

1938年10月中旬起，湖南大学1000多名师生分批到达湘西的辰溪县城头垌。

“教室是枯黄的草地，或大树底下，用木板子做几块小黑板，背起便走。”今年91岁的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杨煜惠老教授至今仍清晰地忆起当时的特制钢笔。“我们把玻璃棒放在火焰上烧软拉伸，扭出尖来，蘸一次墨水可以写出几个字来。”

“甲骨文大学者杨树达教授当时是湖南大学唯一的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全国仅30人），但在元宵节时还买不起一份汤圆。教德文的王舒教授则在课余时间摆个小摊点补贴家用。建筑专家柳士英教授家有5个孩子，严重入不敷出，柳夫人只得卖点油把”。杨煜惠说。

95岁的彭国波老人当时是学校治学组工作人员。“由于是战时，有的专业仅一个学生，可教师也一样地上课，板书写满黑板。工学院李蕃熙、何之泰、唐艺菁、萧光炯等教授上课都非常认真。李蕃熙是机械系主任，他检查学生的机械制图时，每条尺码都亲

自复量，真正一丝不苟。”

1942年考入湖南大学数理系的苏仲湘也曾回忆：“一个数学年级往往只有一二人，但是，师友数人，日夕相对。在轧轧作响的小楼上，在仅糊素纸的板窗前，我们曾多次度过探讨和思辨的时光。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命题曾经多次闯入我们的话题。”

据统计，1938年西迁辰溪学生数为535人，到返校的1945年达1341人，增加了2.5倍，7年间毕业生人数总计1273名，其中，不乏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主要创始人慈云桂、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中国人张逢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卢滨峰、著名新闻工作者苏仲湘等校友。

国土沦亡，山河破碎，师生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批学生投笔从戎，有的直接参加前线作战部队，肄业生志愿参军者百余人。

1938年春，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成立，直接领导抗日救亡民族先锋队，还公开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明日社。

著有《湖南大学在辰溪》一书的老人张必津是土生土长的辰溪人，他写道，“1939年元旦，湖大学生举行劳军活动，为抗日士兵代写书信，为抗日士兵们缝补军衣。1940年1月，学校师生还为前方抗日将士征募寒衣，并给抗日将士汇出1000元。政治系同学绘制了国家形势图及湘北会战图，张贴于辰溪街道各要冲处，让闭塞的辰溪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辰溪老人还都记得“洋膏”的故事。原来战争爆发后，烧碱来源断绝，肥皂奇缺，化工系副教授谭云鹤利用辰溪一带大量的土碱和出产的桐油，试制软皂成功，投入生产，方便了广大民众。从抗战开始，软皂的应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

### 荣光·复临岳麓的浴火重生

“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雄，宋元无此壮；写三楚文章，吊九原将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这是70年前，悬挂在湖南大学科学馆的一副对联。

1945年9月15日正午，抗日战争中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地区受降仪式在湖南大学科学馆举行，侵华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坂西一良代表长衡地区日军，向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呈递投降书。当年报纸曾如此评述：“这其实不只是岳麓山下湖南大学一所学校的荣誉，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

对于为何选择在湖大举行受降仪式，时任校长胡庶华面对长沙各报的采访，特意谈到湖南大学一贯保持爱国传统和面对异族入侵不屈的民族气节。胡校长称南宋末年，为抵御元军入侵，五百余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守城抗敌全部殉难。据调查所知，抗战期间湖南大学没有一人参加伪组织，没有一人当汉奸，这是千余年来先贤提倡民族气节之效。

1945年12月10日，湖南大学召开复员长沙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做出了一个郑重决定：为景仰长衡地区受降典礼起见，特在科学馆内设受降堂，陈列受降时各种纪念物品及战利品，并在科学馆前面建立秦凯亭，竖碑以纪其事。日后如能建一较大之科学馆时，即将现在之科学馆，改为胜利博物馆。

1945年底，湖南大学全部从辰溪复员长沙。由于校舍损毁严重，师生们就用从辰溪拆迁过来的木料搭建临时校舍。“复临舍”，意谓“复员后的临时校舍”，这也就是今天湖大复临舍教学大楼名字的由来。

岳麓山复苏了，千年学府历经日寇五次轰炸和四次长沙会战的炮火劫难后，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

## 抗战记忆

# 南京大学 校史中的抗战记忆

### ■通讯员 王叶菲

抗战期间，南大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师生员工，以各种形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炸弹下淬炼出摧不毁的民族脊梁。

### 顾毓琇：历史剧《岳飞》激起爱国豪情

淞沪战争爆发后，顾毓琇教授亲率中大学生到南京车站为十九路军送行壮志。从车站回来，他翻出昔日所作的《荆轲》剧本，“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让他热血沸腾，豪情顿生。他不分昼夜，伏案挥毫，写成了四幕历史剧《岳飞》，并请张静江题签，连同由吴稚晖题签的旧作《荆轲》印成一个单行本，及时推向社会。

顾毓琇用《满江红》唱出了人民奋起抗敌的共同心声，激起了广大军民的同仇敌忾；……偏安耻，犹未雪，失地恨，何时灭？要从头完整金瓯残缺！民众同仇拼骨肉，将士敌忾涂膏血。到最后胜利定属我，弥前阙！

### 陈裕光：永远不用日货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金陵大学，全校沸腾。当年10月9日，时任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带领金大教职员呈请国民政府移师抗日。学校迅速成立“反日救国会”，组织师生军事训练，并开誓师大会，陈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宣誓，永不使用日货，大大增强了全体师生的爱国热忱。

陈裕光校长“永远不用日货”誓词如下：“我诸师生以复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国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

### 罗家伦：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七七事变前，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均处于稳步发展时期，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8月15日起，日机连番轰炸南京，中央大学建设万人大学的宏大计划随之夭折。校长罗家伦面对敌机留下的弹坑，愤怒而坚定地他说：“寇能覆之，我必能兴之！”

罗家伦在重庆警报声中写作的文章《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中提到：“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成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他提出，“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

### 王伯沆：临大节而不可夺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中大教授王伯沆身染重病，上有八旬老母，不能外出避难，家中一无可洗，常无隔宿之粮，不得已出卖藏书维持生活。一天，王伯沆获悉出高价收买他的藏书的是大汉奸陈群，他立即退还书款，收回原书。据多方劝解，他愤怒地说：“我的书卖给书商，决不卖给汉奸。”后来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知道这件事，特派人送来五百元伪币，他拒而不受，陈公博复驱车前



# 潘懋元教授回忆抗战岁月

### ■潘懋元口述 郑宏整理

1939年春，我在普宁县高垌乡校教书，参加普宁二区青抗会的活动。

汕头市沦陷的消息传到这个小村，虽然思想上不是毫无准备，但我向集合在广场上的一百多名学生宣布这个消息时，悲愤满怀。我父母当时都在汕头。当人们纷纷猜测敌人会不会继续进犯内地时，我决心上前去，我心如火燎，匆匆赶回揭阳。我本来是地下党领导的揭阳青抗会成员，回揭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抗会要求分配工作。刚好揭阳青抗会在组织随军工作队，配合当地驻军保安团做群众宣传、联络军民的工作。

还在随军工作队时，有一天，杨世瑞和刘百泉同志找我，问我能不能潜入汕头沦陷区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我是在汕头长大的，父母还在沦陷区，我说可以。他们说在桑浦山北面同我们并

肩作战的青抗游击队，要在汕头市发展一名地下工作人员，每天在妈屿或磐石监视敌人的军舰往来，运兵运械情况，随时报告给汕青抗的联络员。任务很简单，但有危险，问我有无合适人选。我是在汕头念中学的，熟人不少，脑筋迅速转动，提了几个中学同学的姓名和情况。他们认为一位姓陈的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临行前，世瑞同志一再叮嘱我，情况在不断变化中，过去的同学不一定靠得住。在未充分了解对方的思想之前，切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人选确定后，迅速返回，以免发生变故。

我换上了一身市民的服装，乔装成一个“走单帮”的。当时这种人不小，来往沦陷区做小生意，不太会被人注意。部队当时驻在南隼村的池边，往前行不远，就到了敌我中间地带。从池边到敌占区大井乡，这条路我没有走过，仅凭事前对沿途情况的详细了解。过了我方哨卡，我就把身上所带的符号和证明文件用油纸包好，埋在一棵小树下，顺利地通过中间地带，到达大井。从大井坐小船进入沦陷了的汕头。踏上码头，第一次面对面见到几个敌人。我混

在一群人中弯腰走过，直奔日夜思念的中山公园前华坞路的老宅，已是黄昏了。

父母突然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归来，高兴自不必说，但是惊多于喜。母亲又哭又笑，父亲严肃地责备我不该这么莽撞，要我住一宿天亮速回。我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一宿是不行的。我对他说，住一宿就走，被人发现，反而犯疑。我走了，你们不便，不如高高兴兴住下来，就说是从内地来买货的，过几天再走。父亲无奈何地应允了。我知道他们内心是矛盾的。

第二天，我找到姓陈的同学，这是一位勤劳朴实的青年。他的妈妈是洗衣工人，每天要从汕头渡海到磐石洗衣服。磐石有山泉，洗的衣服特别洁净，叫作“磐石洗”，这种洗衣工当时很多，他就帮妈妈洗衣服和接送衣服。母子相依为命，早出晚归。所以杨、刘和我估计过，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找到他之后，我们先各自谈自己的生活近况，聊一些同学的情况。曲折迂回地了解到他对日伪军的愤恨，对“顺民”生活的悲哀，很希望到内地谋生，但又不能撇开老母不顾。我又逐渐同他谈了一些内地情况，抗战前景。磨了几天，时机成熟了，我才亮出自己的身份，要求他参加一些救国工作，将来国土收复了，

也无愧于国家。他诚恳地说：“你看得起我，我一定干！”这样，我把任务告诉他，并约定了联络员同他联络的暗号。

在这期间，我每天在市场上东转西瞧，打听各种货物的行情，并且了解到敌人是如何以刺刀做准备金的“军用手票”来换当时国统区流行的“国币”，用以掠夺内地的物资。同时，我还找另一位做批发生意的吴姓同学，谈从内地到沦陷区做买卖的门径，摆出一个“走单帮”的样子，万一有人怀疑，也可以找他证明我是为搞买卖而来汕头的。

遵照组织上的批示，我同姓陈的同学谈妥之后，第二天凌晨就离开沦陷区，循原路回来，没想到离开老母亲，竟是永别。三年之后，我从福建赶回揭阳，但是母亲已经永远离开我了，我只能抚棺痛哭。

回到部队，见到杨世瑞、刘百泉同志，他们热烈地与我拥抱，祝贺我完成任务，平安归来。除他们两人之外，宣传组的同志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回来，问我，我说：“特别任务。”谁也不再多问了。大约半个月后，记不清是杨或刘对我说，汕青抗游击队来说，已和姓陈的联络上了。至此，我的“特别任务”才算完成了。我还就我在沦陷区的所见所闻为普宁《青报》写了一篇通讯——《敌人是怎样掠夺潮汕的国币》。

王宏宇 供图

